

广东省博物馆
建馆三十周年
论文集

(1959—1989)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

广东省博物馆编

*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520千字

I S B N 7-80047-068-7/K·26 定价: 9.95元

目 录

前言	薛连山 (3)
广东考古结硕果 岭南历史开新篇	广东省博物馆 (5)
广东旧石器时代文化及其若干问题	莫 稚 (17)
试论西樵山文化	杨式挺 (23)
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的人类与共生动物群	宋方义 (40)
略论华南洞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邱立诚 (44)
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	朱非素 (50)
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杨式挺 (63)
石峡文化墓葬所反映的若干问题	朱非素 (85)
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	杨式挺、陈志杰 (91)
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	朱非素、彭如策、刘成德 (98)
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	徐恒彬 (105)
广东青铜时代述略	莫 稚 (125)
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器文化及其与几何 印纹陶的关系	何纪生 (140)
广东东周时期青铜器墓葬制刍议	邱立诚 (153)
论南越王赵佗	徐恒彬 (158)
试论南越王赵佗的历史地位	张 维 (166)
南越王墓发掘述评	杨 豪 (172)
略论中国古代铜鼓的分布地域	何纪生 (183)
岭南与云南的青蛙族群研究	杨 豪 (193)
广东陶瓷的历史	曾广亿、宋良璧 (207)
石湾窑的起源及其发展	曾广亿 (218)
广东唐宋陶瓷的主要特点	曾广亿 (229)
广东唐宋陶瓷生产发展原因初探	古运泉 (243)

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述略	杨少祥 (248)
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	杨少祥 (253)
广彩与外销	宋良璧 (259)
从连县晋墓出土文物看我国烧酒创始的历史	梁明燊 (264)
记曲江南华寺北宋木雕罗汉像	黄玉质 (267)
广东永历三十一年铜印考	曹腾骅 (272)
浅谈广东揭阳出土明抄戏曲《蔡伯皆》	曹腾骅 (275)
清代虎门炮台考略——兼评苏氏的小册子《虎门》	李才焄 (278)
洪秀全早年在广州活动的几个问题	李才焄 (286)
论孙中山的伟大转变与中国共产党	张 竞 (292)
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总结	张 竞 (301)
论白沙起义	黄壁辉、孙曼云 (307)
海南人民的抗日持久战	孙曼云 (310)
从陈列角度谈《广东近代史陈列》	肖洽龙 (314)
浅谈陈列品说明牌的更新	邱书怀 (319)
博物馆社会效益初探	肖洽龙 (322)
试论博物馆文物保管的科研工作	宋良璧 (327)
捕捉蠹鱼	许方强 (331)
书画的保管环境	许方强 (333)
编后语	曾广亿 (339)

前 言

广东省博物馆是以地方史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筹建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正式对外开放，迄今已三十年了。三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文物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馆各项业务工作和专业干部队伍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提高，在接收文物和征集流散文物，配合各项基本建设工程开展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保护和考古发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举办了近百个陈列展览，观众达四百多万人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广东地处祖国南大门，历史悠久。早在十三万年以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经过漫长的岁月，创造了“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等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秦以前，广东与中原地区的商、周，以及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已有交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进军岭南，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从此广东正式划入祖国版图，在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和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自己，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进入近代，广东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门户，也成了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如火如荼的斗争造就了一批爱国志士仁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反映各个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为我馆文物博物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工作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和光辉的前景。

科学研究工作是博物馆的重要任务之一。三十年来，我馆文物博物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掌握大量的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我馆各项业务，进行了艰辛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博物馆学研究、博物馆专业学科研究方面，特别是在考古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对于提高我馆各项业务工作质量和科学水平，为配合社会上的生产、科研以及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提供宝贵的资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检阅我馆三十年来的科研成果，方便博物馆同仁查阅资料，进一步推动博物馆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特编印这本《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

收入本书的论文共四十三篇，四十余万字。这些论文是从我馆数以百计的论文中遴选出来的，质量虽然参差不齐，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基本上能反映我馆三十年科学研究成果。这些论文，曾先后在《史前研究》、《考古学报》、《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论文集》、《文物集刊》、《中国古代史论文集》、《考古》、《海交史研究》、《古陶瓷研究》、《文物》、《中国博物馆》以及香港《新晚报》、《广东出土先秦文物》、日本《中国陶瓷全集》、美国《时代报》等二十七种刊物上登载和发表。论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按目录顺序分，有广东文物考古概论、石器时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南越王与铜鼓研究、

古陶瓷研究、古墓葬出土文物研究，还有近、现代史个别专题、博物馆学及其专业学科研究，等等。美中不足的是，关于博物馆学及其专业学科研究的论文不多，说明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深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馆的科学研究工作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将取得更大的成果。

在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年之际，谨向支持、关心我馆建设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博物馆界同仁表示深切的谢意！

薛 连 山

1988年12月

目 录

前言	薛连山 (3)
广东考古结硕果 岭南历史开新篇	广东省博物馆 (5)
广东旧石器时代文化及其若干问题	莫 稚 (17)
试论西樵山文化	杨式挺 (23)
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的人类与共生动物群	宋方义 (40)
略论华南洞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邱立诚 (44)
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	朱非素 (50)
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杨式挺 (63)
石峡文化墓葬所反映的若干问题	朱非素 (85)
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	杨式挺、陈志杰 (91)
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	朱非素、彭如策、刘成德 (98)
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	徐恒彬 (105)
广东青铜时代述略	莫 稚 (125)
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器文化及其与几何 印纹陶的关系	何纪生 (140)
广东东周时期青铜器墓葬制刍议	邱立诚 (153)
论南越王赵佗	徐恒彬 (158)
试论南越王赵佗的历史地位	张 维 (166)
南越王墓发掘述评	杨 豪 (172)
略论中国古代铜鼓的分布地域	何纪生 (183)
岭南与云南的青蛙族群研究	杨 豪 (193)
广东陶瓷的历史	曾广亿、宋良璧 (207)
石湾窑的起源及其发展	曾广亿 (218)
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	曾广亿 (229)
广东明清陶瓷生产发展原因初探	古运泉 (243)

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述略	杨少祥 (248)
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	杨少祥 (253)
广彩与外销	宋良璧 (259)
从连县晋墓出土文物看我国烧酒创始的历史	梁明燊 (264)
记曲江南华寺北宋木雕罗汉像	黄玉质 (267)
广东永历三十一年铜印考	曹腾骅 (272)
浅谈广东揭阳出土明抄戏曲《蔡伯皆》	曹腾骅 (275)
清代虎门炮台考略——兼评苏氏的小册子《虎门》	李才垚 (278)
洪秀全早年在广州活动的几个问题	李才垚 (286)
论孙中山的伟大转变与中国共产党	张 竞 (292)
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总结	张 竞 (301)
论白沙起义	黄壁辉、孙曼云 (307)
海南人民的抗日持久战	孙曼云 (310)
从陈列角度谈《广东近代史陈列》	肖洽龙 (314)
浅谈陈列品说明牌的更新	邱书怀 (319)
博物馆社会效益初探	肖洽龙 (322)
试论博物馆文物保管的科研工作	宋良璧 (327)
捕捉蠹鱼	许方强 (331)
书画的保管环境	许方强 (333)
编后语	曾广亿 (339)

广东考古结硕果 岭南历史开新篇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是我们伟大祖国最南的一个省份，上达五岭之巅，下抵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与海外交往的重要通路。广东古代的历史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有本身的地区特点，广东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对了解和研究广东地区的古代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黑暗的旧中国，广东的考古工作也和其他事业一样深深地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除几个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调查清理过一些遗址和少量墓葬之外，别无所为。对广东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谬说纷纭，缺乏根据。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人民政府重视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成立专门机构，建立和培养专业队伍，拨出专用款项，依靠群众认真做好这一工作。广东从土改运动时就开始大量征集保护流散文物，1951年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2月成立文物工作队，7月开展全省文物普查工作，1957年筹建广东省博物馆，1962年7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以来，对马坝石峡、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遗址，大批战国墓，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和西沙群岛的唐宋遗址等进行了调查发掘工作。这些丰硕成果为研究和认识广东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三十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广东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以满怀喜悦的心情，把解放后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作一个初步回顾，向伟大的祖国汇报，向伟大的国庆三十周年表示我们衷心的祝贺。

一

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自然辩证法·导言》）广东地区何时开始有人类活动生息？1958年在曲江县马坝狮子岩洞穴内发现的“马坝人”头骨化石，初步揭开了广东地区人类历史的序幕。

“马坝人”是目前广东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经鉴定为一个中年男性的头骨，眉骨脊粗壮，但不及“北京猿人”突出，属于古人阶段的早期类型，距今约十万年前，是研究猿人向古人演变的珍贵实物。共存的有大熊猫、剑齿象、剑齿虎、中国犀、獾、鬣狗等十七种动物化石，没有发现石器^①。

封开县渔涝黄岩洞底的黄褐色砂粘土胶结层内，发现了大熊猫、剑齿象、犀牛等十多种动物化石，1961年和1978年先后在表层采掘到砾石打制石器八、九十件，多在一边单面或两面打成刃部，制作比较原始粗糙，同时还发现一枚人类牙齿，是晚于“马坝人”的旧石器时代

晚期遗存。1965年在洞口的灰色螺壳堆积中出土的两个人头骨化石明显晚于洞底堆积，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阳春县独石仔洞穴遗址也分为二层，下层为灰黄砂粘土层，发现人类牙齿、头盖骨和单面打制为主的砾石石器、钻孔石器，共存的有犀牛、鹿、猪、牛等现生种动物化石，用火遗迹显著，烧骨和烧土很多；上层为灰褐色泥土胶结层，出土较多的打制石器和少量部分磨光的石器。下层可能已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上层显然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

广东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较多，约计三、四百处，其中经过发掘的有二、三十处。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生活条件的差别，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址可分为洞穴、岗丘、贝丘、沙丘、台地等类型。虽然各类型遗址都有相对的早中晚之分，但总的看，早期多以洞穴遗址为主，中晚期则以贝丘、岗丘、沙丘、台地为主。

早期的洞穴遗址主要分布于粤北始兴、英德、连山和粤西罗定、封开、怀集、阳春等县石灰岩发育地区。英德县青塘遗址经过探掘，出土砾石砍砸器、石砧，都是打制的，还有绳纹、方格纹、篮纹、划纹粗砂陶片，时代早于桂林甑皮岩，晚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③。

南海县西樵山遗址范围大，遗物丰富，经过调查，发现的遗址、遗物地点有二十处，拣获各种石器达数千件。这里盛产霏细岩、燧石和玛瑙石等优良石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打石场。其中只出打制石器和细石器，而未见磨光石器和陶器的遗址，有可能是早期遗存。大量细石器石叶、石片、尖状器、雕刻器和石核在西樵山遗址发现，在我国岭南地区还是第一次，开创了广东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③。

中期以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下层为代表。

陈桥村打制石器多，磨制也有，未见有段式石器。打制的以“螺蛳砧”类的尖状器为多。骨器丰富。陶器主要为圆底的釜、罐、钵，表面抹平，划纹多，还有蚌壳类压印的纹饰及绳纹、篮纹等，口沿或颈部往往涂赭红色宽带彩绘，富有地方特色。在墓葬的尸骨上也有撒赭红色矿物质的现象④。

金兰寺遗址是广东首次发现有明确三迭层的一处重要遗址。上层属战国时代。中层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有段、有肩石砧，曲尺、云雷等印纹陶器，和象征对男性崇拜的陶祖。还有四鹿墓葬，均为仰卧直身单人葬。其中M2为一个25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有人工拔牙的现象。用C₁₄测定贝壳年代为4035±9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495±145年。下层出土有肩石砧，不见有段石砧，夹砂陶占82.5%，磨光红陶占13.6%，彩陶占3.9%，未见几何印纹，只有绳纹、篮纹和划纹。年代估计为距今六千年前⑤。

这类贝丘遗址在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存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以捕捞和渔猎经济为主，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特点明显。

晚期以曲江石峡下层、中层，金兰寺中层和佛山河宕遗址为代表。

这个时期的遗址数量最多，几乎遍及全省。堆积范围大，分布密集，文化内涵丰富，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石器以通体磨光为主，数量、型式空前之多，制造精细，反映出工艺的进步和分工的发展。广东是我国几何印纹陶出现较早、分布范围广和拍印技术普遍流行的一个省区，有着自身的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这时的几何印纹已经相当发达，流行以曲尺纹、云雷纹、方格纹、重圈纹等为装饰。有的遗址的陶器纹饰出现了向青铜时代的夔纹过渡的迹象，这类遗址下限可能已到商代。烧制陶器的窑址在韶关市走马岗、曲江石峡和始兴县澄陂村等遗址中有发现。居住遗迹虽已发现不少，但布局缺乏规律，房子结构还

不清楚。南部近海地区以捕捞、渔猎为主，北部丘陵地区发展了原始锄耕农业，在曲江县石峡和泥岭发现了目前广东最早的栽培稻^⑥，主要是籼稻，还有较多石镢、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佛山河宕等地出土许多猪、狗颞骨，经鉴定，部分已属于家养。

通过对各地晚期遗址内涵的比较研究，我们初步认为广东的原始文化大致分为六个区域，各地区在文化特征上表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

粤北地区：多山岗遗址。石器以长身斧斨、有段斨为主，有肩器很少。陶器以泥质和夹砂印纹陶共存为主。石峡遗址是本区的典型遗址，已发掘三千多平方米。发现墓葬一百二十九座，各种遗物三千多件。晚期墓葬明显出现了贫富分化。为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特征、分期、年代和广东原始社会的解体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⑦。

粤东平行岭和粤中东江地区：岗丘遗址为主。石器以有段和梯形斨为主。陶器以夹砂陶、印纹软陶共存为主。龙川县佗城坑子里，是这一地区的重要遗址，下层出土有完整鸟形壶、圈足罐、凹底罐、高柄细把豆和一件残陶鬲^⑧。

粤东韩江流域地区：以贝丘和沙丘遗址为主。石器主要是有段石斨，少数石器肩不明显，呈溜肩状。陶器亦是夹砂陶与印纹软陶共存，有的夹砂较粗，抹平磨光，几何印纹不够发达，划纹不少。与福建南部原始文化有密切关系^⑨。

粤中低地区即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贝丘和岗丘遗址为主。石器以有肩为主，有肩有段的斧斨也不少。骨、角、蚌、牙质料的工具和饰物占有显著比例。几何印纹陶发达，磨光红陶、彩陶、施陶衣陶是本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⑩。西樵山晚期遗址、佛山河宕遗址和南海灶岗遗址是这一地区代表性的遗址。香港等沿海岛屿亦应属这一区域。河宕遗址几何印纹陶极为发达，印纹清晰，种类繁多，组合纹盛行，上层有向青铜时代以夔纹为代表的几何印纹陶过渡的性质。墓葬的男性头向西，女性头向东，都是单人葬，曾发现有十九个成年男女生前有人工拔牙的习俗。随葬品一般很少，在一男性青年头顶上随葬一对薄如蛋壳的象牙饰物，为我省首见的珍贵文物。

粤西地区即西江流域中游地区：以岗丘遗址为多，也有贝丘遗址。大体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同，与广西东部，（西江上游）地区有着密切关系，如封开三个公社发现的有柄舌形大石铲，广东其他地区目前都没有发现，而广西东南地区却极为常见^⑪。

粤西南、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以岗丘和沙丘遗址为主。文化特征虽以有肩石器和夹斨红褐陶为特征，但几何印纹不甚发达，延续时代较其他地区晚。海南岛地区的双肩石斧，肩多呈直角，器身较短，刃往往稍斜，与西樵山等地的粤中低地区发现的看来是一脉相承的^⑫。

三十年的考古发掘、调查证明，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是在本地区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有自身的特点，又与我国江西、浙江、湖南、福建、台湾和广西等省区的原始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石峡墓中的陶鼎、陶鬲和贯耳壶与江西清江筑卫城下层、修水山背遗址及浙江良渚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扁平穿孔石铲和石琮、璧、环、玦、笄等饰物和良渚文化的相似，与山东大汶口晚期的也较接近。大石琮与江苏吴县草鞋山上层墓葬的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石峡的石镢（弓背斨）曾见于湖南南部的安仁遗址。石峡和河宕出土的陶鬲和陶鬶一样，不是广东本地的发明。至于有段石斨、有肩石斧、几何印纹陶、彩陶等分布更为广泛，包括台湾、金门、香港等地都有。增城、曲江、佛山、南海等县市出土的人骨架经鉴定均属南亚蒙古人种，具有明显的黄种人特征。拔牙的风俗已经流行，与山东大汶口、江苏邳县大

墩子、福建闽侯县石山、台湾屏东鹅銮鼻、湖北房县七里河等新石器时代的风俗相同。我国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在文化上联系交往密切，在族源上也可能有一定的联系。

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财富不断分化，广东地区的原始公社制日趋解体。在中原文化，尤其是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强烈影响下，先进的青铜器及其铸造工艺由北方传入广东，促进广东地区逐渐向奴隶社会过渡。

目前广东发现的最早青铜器是信宜县松香厂出土的西周铜盃，与见于著录的龙纹盃极为相近。商代青铜器还没发现。这件西周铜盃造型巧妙，纹饰精美，工艺水平高，显然不是本地铸造，而是直接由北方输入的^⑧。广东本地铸造的最早青铜器是饶平县出土的青铜戈。

1974年冬，饶平县浮滨公社桥头大队塔仔金山和联饶公社深涂大队顶大埔山发现了二十四座土坑墓。出土各种大口长颈圜底尊、圈足盘、平底或圜底罐等陶器和釉陶器，还有各种砬、戈、矛、环等磨光石器。釉陶表面挂一层棕褐色釉，釉下印条纹或方格纹，还有些在沿内或肩部刻划各种文字符号。其中顶大埔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戈，直内，援部平，无胡无栏，援的后部和内的后部各有一穿孔。这件铜戈形制与外地所见差异很大，工艺较粗，是广东铸造的最早青铜器。釉陶器不少已经属于原始瓷器，与广东常见的商代几何印纹陶不同，同类釉陶器仅在粤东惠阳、普宁、潮安等地的墓葬中见到，表现了明显的地方特色。由于缺乏对比材料，我们初步定为周代，也可能早些，也可能晚些。

1962年和1963年，在清远县三坑公社马头岗连续发现了两座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均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品^⑨。这一发现对秦以前广东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一次突破，在广东的史学界和考古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此之前，不少人认为广东没有青铜文化，没有经历奴隶制社会阶段，秦统一岭南后由原始社会直接跃入封建社会。继清远的发现之后，文化大革命中又在德庆、肇庆、四会、广宁、怀集、佛岗、龙川、罗定、龙门、揭阳、佛山等县市陆续发现三十八座春秋晚期至战国的墓葬，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表明广东确实经历过青铜器时代，也不可能没有奴隶制^⑩。

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品的墓葬，大部分在西江地区，少部分在北江、东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山岗上。这些河流正是古代广东人民与长江流域及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大墓较少，中小墓多，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些墓底铺设河卵石或木炭，也有些墓底分成高低级的前后室，大墓使用棺槨，小墓不见葬具。部分墓虽曾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多数墓保存较好，随葬器物相当丰富，三十八座墓出土共达八百七十九件。其中青铜器七百一十八件，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陶器一百〇六件，还有一批石、玉、金、琉璃等器物。

青铜器在墓内按一定规律组合，分炊器、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六类。兵器和工具数量最多，达五百九十三件。容器数量较少，但铸造都相当精美。器形共五十余种，有鼎、鬲、鉴、盃、壶、盘、缶、编钟、铎铎、剑、矛、镞、钺、斧、凿、篋刀、匕首、削和人首柱形器等。

从器形和纹饰分析，广东的青铜器大体有四种情况：（1）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如清远墓的两件铜鬲。（2）与长江流域的相似。如鼎，分为折沿直口、盘口半环耳、敛口附耳等式，三实足细长外撇，耳饰云雷纹、绶纹和绳纹，壁甚薄。这类鼎在江

苏、江西、湖南等地均有出土。各式剑与五岭以北流行的式样一致，鉴、杯、缶、壶、盘、钟、钲、铎、矛、斧、凿、削等器物在湖南楚墓、寿县蔡侯墓都有相似器物出土。容器和乐器多饰花纹，常见各种云雷纹、蟠虺纹、绶纹、锯齿纹。这种情况说明广东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属于同一类型，尤与楚文化关系密切，大部分青铜器与楚器相近。(3)与广西、云南、贵州有一定联系。青铜器中的钺和戚二种，楚地甚少见到。广东出土的钺有扇形、靴形、铲形、戚为椭圆形，皆长方釜或椭圆釜口。类似器物多见之于滇、桂、黔，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广东与西江上游各地已有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4)富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如匕首、附耳筒、圆球形器、方印形器，簋刀、人首柱形器等，多用人物、人面、藤纹、席纹为装饰。这类器物地方特点明显，是本地铸造，仅有少量见于广西东部等地，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因素在汉墓中还可见到，反映了古代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相互影响的友好关系。

广东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更多的还是遗址，约近三百处，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夔纹、云雷纹陶器为主要特征，共出少量磨光石器和各种砺石。在曲江石峡遗址上文化层等十九处地点，还出土或采集到五十件青铜器^⑤。另一类以米字纹、方格纹和刺划纹陶器为主要特征，除有青铜器出土外，晚期遗址还发现铁器。这两类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与墓葬中所见的基本一致。

两类遗址的陶器都属于几何印纹陶系统，由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曲尺纹、方格纹、云雷纹为主要特征的几何印纹陶发展而来。以夔纹陶为代表的阶段由于已使用青铜器，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陶器制作技术达到广东几何印纹陶的鼎盛阶段。陶器的胎质多数较硬，火候高，扣之有铿锵声，普遍使用慢轮修整。常见器形有缶、罐、尊、豆、钵、盘、碗、杯等。圈足较少，流行圈平底。器表盛行拍印夔纹、勾连雷纹、圈点纹和方格纹，花纹清晰规整，阳纹和阴纹对比鲜明，盛行组合花纹，风格与青铜器纹饰一致。典型器物是敞口或直口束颈长圆腹圈平底罐。这时还出现釉陶器和原始瓷器。以米字纹为代表的阶段上承夔纹陶阶段，胎质相同，制法主要以轮制为主，高大的平底器多，三足、圈底和圈足器少见。几何印纹已经衰落，仅见米字纹、方格纹等数种，拍印粗疏。刺划的水波纹、弦纹和篦纹增多。釉陶器占有一定的比例。典型器物是米字纹卷沿宽肩平底大陶罐和大匏壶，高达52厘米。还有罍、碗、杯等器物。战国时期的窑址发现两处，均烧制米字、云雷、方格等印纹陶器和水波纹、弦纹、篦纹等刺划纹陶器，与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一致。增城县西瓜岭一号窑残长9.8米，是目前所见最长的一座战国窑址，把我国流行的“龙窑”的历史大大提前，为研究窑炉的发展提供了新资料。始兴白石坪山窑址为圆形的，全貌残不可见，还出土了两件广东最早的铁器^⑥。

上两类遗址的时代与墓葬大致相当，以夔纹陶为代表的遗址主要属于春秋时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中还有夔纹陶类的陶器随葬。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遗址主要属于战国时期，西汉早期墓中还见到少量这类陶器。

广东出土青铜器的遗址和墓葬证明，广东从周代起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春秋以后青铜器迅速增加，到战国后期还出现了铁器。广东的青铜文化受楚国的影响最为明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楚任用吴起“南平百越”的记载。根据墓葬规模的大小，随葬器物的精美，青铜器的多少，以及成套编钟和人首柱形器等礼乐器物的出土，说明当时广东存在着奴隶制度。但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广东各地的社会发展不可能平衡。如夔纹陶类型的遗址

在湛江地区较少见，而海南岛未发现，社会发展显然较缓。当先进地区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时，还有不少边远的地区仍然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三

广东进入封建社会显然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设置南海、桂林和象郡，推行封建制度开始。秦汉至南北朝，是封建制在广东建立和巩固的阶段，是广东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解放后，清理发掘的秦汉墓葬非常多，达七百多座；遗址发现很少，仅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英德县鱼嘴、顺德县逢简等十余处。秦和西汉墓主要集中于广州市，发掘清理近三百座。此外，顺德县沙富、曲江县马坝、南海县盐步、佛山市澜石、龙川县佗城、陵水县军屯坡等地也有少量发现。东汉墓比西汉墓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群葬。已发现和发掘的墓葬群，除广州市外，重要的还有佛山市澜石、韶关市河西、南海县平洲、增城县金兰寺、徐闻县华丰、德庆县大辽山等地。此外，连县、曲江、英德、乐昌、怀集、连平、清远、肇庆、东莞、番禺、顺德、四会、揭阳等县市也曾发现一些东汉墓。

广东的秦至西汉墓分为二期，前期包括秦统治岭南的七年和南越割据政权统治的九十三年（前205—前111年）；后期从汉武帝灭南越割据政权开始，到西汉王朝结束为止。也有把西汉后期再分为二期的。东汉墓亦可分为前后二期^⑩。秦至西汉前期墓的明显特点是：1.保留一些战国遗风和秦代文物，如印纹陶、“楚式镜”和秦戈等^⑪；2.地方色彩比较明显，如出土匏壶、附耳筒等器物，还有陶瓮上印有“长秋居室”戳记的南越割据政权的贵族墓等^⑫；3.“汉式陶器”迅速发展为主要随葬器物，与岭南以北地区的汉墓渐趋一样。这些特点真实地反映了秦统一后，封建制推动了广东地区的社会发展，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逐渐一致，反对分裂要求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西汉后期墓葬地方色彩显著减少。东汉墓多数是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多是“聚族而居，合族而葬”，“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饮食器用、珍宝玩物、偶人车马无所不备，反映出豪强地主庄园经济在广东的发展。

秦汉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铁器数量、种类比战国时期大大增加，说明当时铁器已普遍使用。到目前为止，广东出土战国铁器仅有铁口锄、铁斧二件，秦汉铁器则有三百多件，增加一百五十倍以上。种类由二种增加到二十二种。铁兵器有矛、戟、剑、刀、匕首、镞等六种，铁工具和用品有斧、凿、铁口锄、镰、削、镢、弓形器、钩形器、码钉、钉、条形器、环、剪、三足炉、铺首、带钩等十六种。同战国相比，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⑬。

铁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牛耕的推广，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广东在南越割据政权统治时对牛和铁器的需要十分迫切，《史记·南越列传》中有明确记载。广东从西汉后期起，流行用陶牛为明器随葬，牛的形象塑造得相当生动和逼真，真实地描绘出广东人民对牛的喜爱和重视。东汉随葬陶牛更为普遍，几乎较大的墓都有陶牛作明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牛耕的推广和发展。佛山市澜石东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在这一方陶水田内，有两个陶俑分别在犁田，陶俑一手作扶犁状，一手作赶牛状，所塑的犁铧呈“V”形，中间凸起，不但能破土划沟，而且可稍向两边翻土，显然在犁铧的发展上已向前迈进了一步。陶俑使牛的姿势表明，不是二牛抬杠的耦耕方法，而是一人使牛犁田的先进方法。佛山和广州出土的陶田都很平整，利于灌溉和耕种。佛山的陶田旁还

附有小船，富有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特点。从陶田内其他陶俑的动作和秧苗、肥堆等看，当时可能已经实行二造制和移栽秧苗的新技术^②，广东出土的汉代陶屋不少设厕所、猪圈，有的猪圈和厕所在一起，对积蓄人粪尿相当重视，这不仅仅是注意卫生，应与“粪田”的普遍需要密切相关，还发现过加工谷物的石磨和杵臼、筛等陶模型器。出土的长方形和圆形陶仓廩相当多，都是栅居式，既防雨又防潮。出土谷物不多，只有稻和黍，另有具南方特点的橄榄、梅、酸枣、人面子和花椒等实物发现^③。

广东滨临南海，河道交错，交通主要靠水运是一大特点。秦统一后，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交通贸易繁荣，为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74年底发现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是广东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个造船工场规模巨大，船台结构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量五、六十吨的木船，显示了秦汉时广东造船的高度技术水平^④。类似的木构遗迹在不少地方也有发现，因此有些同志提出这类遗址可能是一种建筑遗址，而不是造船工场和船台。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继续发掘和开展必要的学术讨论。广东汉墓多次出土木船和陶船模型。西汉木船中有较大的舱房，盖顶为四回式，前有四人划桨，后有一人以桨作舵掌握方向。东汉陶船规模更大，分前中后三舱，舱上有篷盖，尾部设望楼，后舱右侧还附一小间，有门相通，两舷设撑篙用的边走道。船尾安有舵，船头设有锚，表明造船和航行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船首两边安插三根桨架，船舱部分横架梁檐八根，这样能使船只骨干坚强，加深吃水量，可经受一定风浪，起到平稳作用。此外，还出土一些陶、木制的下田使用的农用船、鱼船和小艇等模型。

《史记》、《汉书》记载，番禺（即三国后的广州）是我国南方“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进行贸易的一大都会。广东汉墓普遍出土琉璃、水晶、玛瑙、琥珀等质料的珠饰和碗等器物，还有陶制象牙、犀角模型。徐闻是我国汉代著名海港，华丰等地东汉墓群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汉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提供了线索^⑤。

西汉前期墓中还出土有少量战国流行的拍印和刻划纹饰陶器，西汉后期釉陶成为主要的随葬器物。汉代釉陶中，有一部分胎质灰白坚硬，火候高，青黄色釉，比原始瓷进步，应是汉代的青瓷器。广州的漆器工艺水平相当高。1953年在西村出土“番禺”铭记西汉椭圆形漆盒，还有造型新颖、工艺精巧的镶玉三足漆杯。铜器也比较精致。

广东汉墓出土的建筑模型，数量最多的是二合式、三合式、四合式住宅建筑，还有不少城堡、望楼、作坊、楼阁、仓廩等建筑。这些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普遍用瓦，比过去流行的干栏式竹楼建筑显著进步。从广东出土的建筑模型看，中国建筑的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在结构设计上注意通风防潮，适宜于南方多雨炎热的自然条件^⑥。东汉中期以后的墓葬和北方其他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一样，更多地出现炫耀地主庄园经济的成套模型明器。广州建初元年墓中出土陶城堡模型，高墙围绕，前后大门上设门楼，门楼之下设执兵器的武士守卫，四隅还建有角楼。城中的殿屋建筑内，有凭几端坐的主人，还有击鼓、匍伏、拱手弓腰或跪伏朝拜等不同形态的吏役。佛山、南海、广州出土门口有人持兵看守的陶作坊，里边有奴隶从事舂米、屠宰等劳动。这类明器形象地表明东汉时期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豪强地主纷纷建筑坞堡，割据一方，残酷地压迫和奴役农民和家内奴隶^⑦。

汉代的少数民族文物在广东发现不多，只在罗定、信宜、郁南、云浮、临高、陵水等县发现过汉代铜鼓、铜锅、铜鼎。其中云浮县托洞出土的四蛙铜鼎是一件罕见的珍贵文物，鼎的盘口上立对称的双耳，束颈，鼓腹，圆底有三个弓形高足。肩上饰四个青蛙，盘口和腹上

还有二个对称鑿的耳。这件铜鼎上的青蛙，与同县出土的云雷纹铜鼓上的青蛙一模一样，是广东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三国至南朝时期，广东的埋葬习俗显著变化，类似东汉时结构复杂的大型砖室墓在东晋后已经不见，盛行长方形砖室小墓，多是薄葬，随葬器物少而单调。墓葬的数量比东汉墓大大增加，分布范围也较广，标志着人口的增加。1954年广州西晋墓中出土的砖上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的砖铭，反映了在长期的战乱中，广东地区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以及人民群众反对战争要求安定的愿望^⑧。1963年在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墓发现的陶水田犁耙模型是一件重要的文物，畜拉抄耙的出现为我国南方地区发展水稻生产提供了技术条件^⑨。同时的墓中还出土有牛、马、羊、鸡、鸭等家畜、家禽陶模型，说明农田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粮食生产和六畜兴旺。

晋人重视书法，广东的晋墓也同其他地区一样，经常随葬青瓷砚和石砚。我国人民同伊朗人民之间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和友好往来。1960年在英德县浚洸南齐“建武四年”（497年）墓中发现三枚波斯银币^⑩，1973年在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中，出土九片波斯银币。银币的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中央为祭坛，上有火焰和星月，两侧各有一个祭司相对而立。英德的波斯银币上穿孔，可能作过装饰品。曲江的银币各片之间无法合对，应是不同的九个银币剪开用来流通使用的。波斯银币在我国西北、中原、华北地区发现很多，长江以南地区仅有英德、曲江两地发现，表明我国不但从陆路的“丝绸之路”同波斯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而且海路的交通和贸易也得到发展。

四

广东地区隋至明清时期的考古，内容丰富多彩，带有广东的历史特点，为研究我国南方经济发展、对外贸易、边疆开发、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唐代著名诗人、开元名相张九龄是广东曲江县人（当时属始兴郡），他的墓自宋以来曾多次修葺和被盗掘，1960年发掘时仅出土一些粗陋的陶器、青瓷器、滑石器、陶砚，比较贵重的随葬品只有汉白玉器。重要的有广东迄今发现的唯一的唐代壁画，以及刻有张九龄子之名“拯”的陶砚和墓志一合。墓志不仅书法美观，而且为考证死者生卒时间、校正《旧唐书》中的错字提供了可靠证据^⑪。

五代南汉小朝廷统治广州地区五十五年（917—971年）前后有四个皇帝，都是奢靡荒淫的统治者。1954年在广州石马村（原属番禺县）清理了第三个皇帝刘晟的昭陵。该墓早年被盗，残存部分出土近二百件陶瓷器，还有石刻、残丝织物等。其中的青釉四耳罐、六耳罐和夹耳罐，造型美观，釉色晶莹，是同期青瓷中罕见的精品，代表了广东制瓷艺人的高度技术水平^⑫。高要县北宋墓出土的抄手砚，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端砚。

广州东山明工部尚书戴缙夫妇合葬墓出土了大批丝织品、服装和鞋袜等，保存完整，对研究明代的纺织和服式颇有价值^⑬。揭西、大埔明墓出土的花卉、山水、花鸟扇面，为研究岭南绘画提供了重要实物。1958年初，揭阳县明墓发现嘉靖年间手抄本《蔡伯喈》（即琵琶记）曲本两册，是元末明初人高则诚所作。一册是总纲，一册是小生使用的已本^⑭。近几年潮安县明墓又出土一本明宣德七年手抄剧本《金钗记》。这两个明代曲本是研究我国戏剧发展和探索潮州戏渊源的珍贵资料。

1962年在大埔县清理的清初吴六奇墓，出土一百三十五件陶俑和家具、炊器、赌具、

案、轿等模型器，形象地反映了吴六奇生前坐堂、出巡和内庭生活的情景。陶塑技巧极高，器具逼真，人物神态生动，是清初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吴六奇是兼称将军的总兵官，蒲松龄的著名小说《聊斋志异》中有他的故事。

在我国南方的辽阔南海上，分布着二百多个珊瑚礁构成的岛礁。它们大体分为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四个群体，组成我国最南的一片领土——南海诸岛。

1974年春和1975年春，我省考古人员先后两次到西沙群岛进行文物考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⑧。在甘泉岛上发现了一处唐宋时期的居住遗址，出土各种陶瓷器、铁刀、铁凿、铁锅残片等遗物一百余件，还有当时居民吃剩抛弃的鸟骨、螺蚌壳以及烧煮食物的灰烬。唐代青釉陶器有双耳罐、四耳罐、瓜棱壶等；宋代青瓷有各种碗、瓶、盒、钵、盏等，刻划莲瓣纹、卷草纹、篦纹，有些还加施酱褐色点彩。这些器物与广州西村皇帝岗窑址等地的出土物相同。这处遗址证明，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广东沿海人民已经移居西沙群岛。在琛航岛、广金岛、金银岛、永兴岛、珊瑚岛等地，还出土有宋代和明代铜钱、清代瓷器。进一步说明自唐以后的开发经营范围日渐发展，扩至整个群岛。

在北礁、南沙洲、全富岛、珊瑚岛、金银岛、蓬勃礁等地礁盘上，考古人员和渔民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陶瓷器和宋代石砚、明代铜器和清代石雕（石狮、石柱、石磨、石屋脊）、石材、砖瓦等遗物。陶瓷器自南朝以迄明清历代均有，产自浙江、江西、福建、广西、湖南和广东等地。在北礁还发现了大批铜钱和铜锭、铜镜、铜剑鞘等，据分析很可能是明初郑和船队所遗留。这些礁盘上的遗物证明了我国人民远在南朝以前就已经发现了西沙群岛，一千多年来南海诸岛与祖国内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历代均有各种官船、商船从东南沿海港口驶来，由于不幸触礁沉没才将大批器物遗留至今。

明清以来，海南岛渔民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到西、南沙群岛航海、生产和居住，留下了许多文物，尤以《水路簿》和“孤魂庙”二者最重要。《水路簿》是渔民们在西、南沙群岛的航海针经书，世代手抄留传，记载着一百多个岛礁水道地名和三百多航行针位更数，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用价值。是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心血结晶。“孤魂庙”都用珊瑚石建造，仅西沙群岛就发现了十四座。渔民们用以供奉“一百〇八兄弟公”，实际是怀念数百年来在西、南沙群岛不幸遇难的先辈亲人，是南海诸岛与祖国血肉相连的历史见证物^⑨。

西沙群岛的历史文物证明，南海诸岛是我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开发经营，也是由中国政府最早进行管辖和行使领土主权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

汉代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日趋繁荣，外国商旅取道广州而来的日渐增加，广州发展成为我国南方的大港市。唐代为了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于广州设置“市舶使”，“以收商舶之利”。对外贸易的范围扩展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的缅甸、泰国、马来亚、斯里兰卡、印度、阿拉伯、波斯、东罗马等国。宋代，广州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史·食货志》载“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专理对外贸易事务，瓷器、丝绸、铜铁等手工业产品大量运销亚非等地。元、明、清继续发展。

由于广东处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为供应对外贸易需要，因此陶瓷业极为发达。解放后发现了一百多处古窑址，多数在河流两岸便于运销的地方。著名的北宋潮州窑遗址分布范围最大，俗称“百窑川”。出土的日用瓷、美术瓷数量多，质地精，其中有高鼻卷发的瓷西洋人头像和短脸、垂耳、身矮的瓷西洋狗，无疑是专为满足对外贸易需要而作。潮州窑的产品大量运销海外，生产繁盛，烧造技术高，已经普遍使用斜坡式阶级窑，规模巨大，有的长达